

陈晓鸣 ◎ 著

江西

师范大学历史学文库
传统社会与近代转型丛书

中心与边缘

——九江近代转型的双重变奏
(1858 ~ 1938)



江西日报出版社

陈晓鸣 ◎著

江西师范大学历史学文库
传统社会与近代转型丛书

中心与边缘

——九江近代转型的双重变奏
(1858 ~ 1938)



江西日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心与边缘——九江近代转型的双重变奏 (1858 ~ 1938) / 陈晓鸣著

- 北京: 经济日报出版社, 2008. 1

ISBN 978 - 7 - 80180 - 881 - 3

I. 中…

II. 陈…

III. 九江市地方史 - 研究 - 1858 ~ 1938

IV. K295. 6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094877 号

书 名: 中心与边缘——九江近代转型的双重变奏 (1858 ~ 1938)

著 者: 陈晓鸣

责任编辑: 陈昌文 孙景美

责任校对: 松会敏

出版发行: 经济日报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宣武区右安门内大街 65 号 (邮编: 100054)

电 话: 010 - 63568136 (编辑部) 010 - 88282292 (邮购部)

网 址: www. edpbook. com. cn

E - mail: jjrbjb@163. com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市朝阳区小红门印刷厂

开 本: 880 × 1230 1/32

印 张: 10. 625

字 数: 240 千字

版 次: 2008 年 1 月第一版

印 次: 2008 年 1 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80180 - 881 - 3

定 价: 28. 00 元

特别提示: 版权所有 · 盗印必究 · 印装有误 · 负责调换

《江西传统社会与近代转型》总序

方志远

呈献给读者的是万振凡、陈晓鸣、游海华、谢宏维、李平亮五位青年学者的专题研究成果。这五部著作从各个不同的角度，以特定的“地域”为个案或中心，对清代至民国时期的江西社会特别是江西传统社会的近代转型问题进行了讨论。

这些年来，受国内经济发展和国际学术思潮的双重影响，中国历史学发生了极为深刻乃至带有革命性的变化。这些变化在学术理念、学术视野、研究方法、关注热点、思维方式及表述方式等各方面都表现出来。不管人们愿不愿意，中国的历史研究实际上已经进入多种学说并存、各种方法并用的时代，地方社会研究、区域经济研究及近代社会转型问题研究更形成了浩浩荡荡的学术潮流。五位作者多年在外地求学，感受风气之先，投身于这一学术潮流之中，可以说是真正“预流”了。^①

从作者的角度来说，这几部著作的选题显然都经过深思熟虑。九江在明代已经是全国七大钞关之一，也是江西唯一的长江口岸、唯一的近代开埠港口，风雨沧桑中记录着江西由传统走向近代艰辛而蹒跚的脚步。万载流民与土著之间的矛盾和斗争清初以来就引起了广泛的关注，乃至与台湾民众的暴动遥相呼应，这故事背后又有

① 陈寅恪《陈垣敦煌劫余录序》云：“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采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治学之士，得预于此潮流者，谓之预流（借用佛教初果之名）。其未得预者，谓之未入流。”见《金明馆丛稿二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236页。

哪些故事？苏区研究是热点，但对后苏区时代这片土地上经济社会重建和复苏的研究却刚刚起步，这种反差可以理解，但这块禁区确实应该被打破。南昌是江西的省会，自然也是士绅“精英”集聚之地，他们在近代社会转型过程中做了些什么，为何没能像上海、苏州、杭州、广州乃至长沙、昆明的士绅那样，尽快把江西推向近代化？江西是传统农业和手工业发达的省份，今天的“三农”问题仍然十分严峻，这种“传统”是如何向“近代”转型的、转型到了何种程度？其间的痛苦和曲折也该认真进行理性探讨。

不少学者在研究自己的“个案”时，总要声称这个个案如何与众不同、又如何具有典型意义。平心而论，我认为上面这些课题并没有什么特别的与众不同，也不具备“唯一性”。恰恰相反，它们却具有多发性。万振凡博士所讨论的上世纪二三十年代“革命前后”的江西乡村社会结构变化、游海华博士所讨论的红军撤离后前中央苏区经济社会重建与恢复，在同一时期全国各地的苏区、白区也同样存在。陈晓鸣博士所讨论的关于近代九江“中心”与“边缘”角色转换，至少在长江沿岸也不乏类似的例子。谢宏维博士讨论的流民与土著问题、李平亮博士讨论的士绅在地方社会的作用问题，不用说全国，即使在江西范围内，也不是个别的。但这丝毫不影响上述课题的意义和价值。其实，越是没有特殊性，越是不具备唯一性，课题的研究或许才越具有普遍意义，才越可能为其他的研究提供参照系。从绝对意义上说，“随机抽样”的代表性比“选择试点”要大得多。

创新是学术研究的基本属性，但这种创新可以表现在多个方面。比如新资料的被发现或老资料的新解读，再比如在前人研究基础上的新发现、新突破。当然，也希望有新的理论或方法被引进或被运用。一个好的学术研究，当然希望有多处创新乃至突破性的发现，但所有历史研究的创新，又都建立在一个最基本的要求上，那就是用材料说话。史学研究可以有多个假设，也可以有多种方法或手段，但必须要有材料为基础，否则，假设永远是假设，方法和手

段也成“空手道”。

我并不企望这套书在所有方面都有重大突破，只是希望每项研究与已有的相关成果相比，材料更加丰富一些，最好有新材料被挖掘，并在资料的考辨上多下功夫；只是希望它们的视野更开阔一些，对历史的理解更深一些，对现实的关怀更多一些，能够提出将研究推向深入的问题。或许是个人的偏见，我最不希望看到的是在同一个模式或板块中符号或名称的变更，如“江南”换成“江西”、“四川盆地”换成“吉泰盆地”、“太湖流域”换成“鄱阳湖流域”，乃至“赣东北”换成“赣西北”，等等。我同样不希望这些研究是单个的、孤立的、无视国家权力存在的所谓地方社会研究，在中国大地上恐怕还找不到不受政府影响的“世外桃源”。如果其中有作者宣称：在赣江流域也发现了施坚雅的“六边形”、在江西地区也看到了黄宗智的“内卷化”和杜赞奇的“文化权力网络”；如果其中有作者宣称：我研究的这块地方就是这块地方自身的发展过程，就是纯粹的“这一个”，至于其他因素，非我所知。如果是这样，改一句流行歌词：“如果是这样，我真的很悲哀。”所幸的是，结果不是这样，作者们所进行的，都是具有一定创见性的资料详实的实证研究，作者们都是在充分关注国家权力与底层社会的关系中、在历史发展的动态进程中讨论自己的“个案”。

游海华《重构与整合——1934~1937年赣南闽西社会重建研究》涉及到的是一个早就应该讨论却还没有来得及深入讨论的问题，一个被重重迷雾笼罩的问题，即后苏区时代赣闽边区的重建问题。1929~1934年间，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战犹酣”，处于“围剿”与“反围剿”中心区的中央苏区，即赣闽边区，其人口、经济与社会遭受巨创。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但革命之后——不管是暂时的失败还是永久的胜利——老百姓还要居家过日子。1934年底，国共大规模争战结束后，南京国民政府在重建赣闽边区地方政权的基础上，在社团组织恢复、难民救济、民众思想整合、社会关系调整、社会经济复苏及产权处置等方面采取了一系列举措，确定

了社会经济发展的基础。至 1937 年春，边区社会重建与整合基本完成。尽管此过程中少不了并仍然伴随着阶级利益的争斗，但它促使社会经济呈恢复性成长，加快了边区向现代社会的转型，同时也为日后东南抗战夯实了基础，有力地支持了中国的持久抗战。该书在唯物史观的指导下，在历史与现实的结合上，注重传统史学和社会史方法的运用，并采用社会学、社会心理学、经济学、民法学等学科的理论与方法，从现代化转型和社会发展观层面考察了 1934 ~ 1937 年间赣闽边区的社会重建与整合。可以相信，通过对这段历史的梳理，总结良性社会发展所应具备的基本社会规律（则），对于促进当前公民理性认识和有序推进新世纪的中国社会改革，对于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对于成功构建长期稳定、协调发展的和谐社会，具有启示性意义。

晚清时期，由于地方军事化的需要及市场网络的重组，不少“新社会阶层”通过军功、捐纳等“异途”进入到士绅的行列，导致南昌士绅构成的多元化。清末科举制的废除、民初议会政治的出现，又使不少“耕读”士绅失去了传统的政治优势和社会地位，南昌的士绅阶层一度趋于分化与解体。但是，士绅们在外部世界的启示下，通过成立各种社团、创办新式学校和组建议会，广泛参与各种地方事务，在角逐地方权力的过程中实现了社会重组，对地方政局实现了全面控制。特别重要的是，在士绅阶层创办新学、推进地方自治、参与议会政治等“现代化”活动中，南昌的社会文化传统得以延续并发生了转化，实现了传统与现代因素的有机结合。这是李平亮《卷入大变局——晚清至民国时期南昌的士绅与地方政治》给我们讲述的一段清末民初南昌地方社会的转型故事。作者将人们常说的“内因”与“外因”置于同一历史脉络之中，对社会转型时期的内在机制进行了颇有见地的分析，也试图在政治制度和社会文化两个层面的相互关系和影响中揭示南昌的近代化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士绅阶层既没有被“边缘化”，也没有急于依附“现代国家”而脱离地方社会，他们既积极参与各种现代政治事务，又仍然

热衷于传统社会活动，从而在自身的重塑中实现了对地方社会的全面控制，而宗族组织、神庙系统、慈善机构等地方文化也十分自然地融入现代国家之中。

与李平亮研究江西的中心城市不同，谢宏维将目光投向了赣西山区的万载县。在《和而不同——清代及民国时期江西万载县的移民、土著与国家》中，谢宏维向我们讲述了这个曾经令中央政府关注的蕞尔小县是如何在争斗不息中构建起相对安定的地方社会的。明末清初移民的大量进入，影响了万载县此后几百年间地方社会的变迁。在此期间，移民与土著、移民与国家、土著与国家、移民内部、土著内部、国家官员内部，以及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的权力关系，微妙纷呈、错综复杂，时时引发剧烈的矛盾与冲突。本书按照时间顺序，从地方社会的历史发展脉络出发，把土、客矛盾所引发的一系列冲突事件纳入地方社会的发展脉络和权力关系中，以揭示在国家的影响下土客关系演变的机制与逻辑。作者致力于收集和利用地方文献，强调文献解读与实地调查的结合，强调“地点感”和“时间序列”的重要性，追寻和把握区域社会发展的内在关系。通过一个个具体事件的研究，努力把田野调查和文献分析、历时性研究与结构性分析、国家制度研究与基层社会研究真正有机地结合起来。通过细致地重构江西万载县 300 多年间跌宕起伏的土客冲突——国家应对的历史过程，作品向我们揭示了万载县土著和移民通过几百年的矛盾斗争悟出的一个道理：要和平共处、要安定和谐，就必须遵循从事经济和社会活动的最基本的行事方式，必须遵循最基本的办事规矩。而这些本来最普通不过的规矩，在特定的情况下竟然需要通过反复的冲突并付出沉重的代价才能被接受。

九江特殊的位势，使其在历史上所扮演的角色带有明显的双重性。明清时期，九江在江西经济体系中处于边缘，但在长江流域却发挥着货物调剂中心的功能。近代开放以后，九江的角色随着全国市场和流通格局的变化发生了转换：在江南腹地的江西，九江从传统社会经济的边缘转为近代进出口贸易的中心；但在长江流域，九

江却由传统社会的货物调剂中心转为近代贸易体系的边缘。这种角色换位决定了九江的市场空间和发展方向。陈晓鸣《中心与边缘——九江近代转型的双重变奏（1858～1938）》，选择从中心到边缘双重角色换位的角度对九江进行专题研究。全书综合运用历史学、城市学、经济学、社会学等有关理论和方法，将九江与其所处的江西腹地和长江流域作为一个整体进行了多方位的考察，深入探讨了九江社会的传统功能与近代角色的转换，论证了九江以内外贸易为纽带、与江西内腹地区以及长江贸易中心城市之间互补互动的双向关系，剖析了九江从中心到边缘的变换历程，并以九江城市为基点，从经济转型、城市发展、城市社会变迁等方面对九江近代社会的转型进行梳理，揭示了九江近代转型不完整性这一基本特征，进而探讨了九江在中国城市近代转型中所具有的类型学意义。

万振凡《弹性结构与传统乡村社会变迁——以1927～1937年江西农村革命与改良冲击为例》仔细分析了革命前后江西乡村社会结构，认为“弹性结构”是土地革命前江西传统乡村社会结构的要害。作者从传统乡村社会结构要素的再生功能、结构系统的弹性空间和整体结构的弹性三个层面，对传统乡村社会弹性结构进行剖析，并根据弹性力学原理，构建了“传统乡村社会弹性结构”在外力作用下的运行模型。作者提出，传统乡村社会变迁的过程，实质上是革命与改良这两种社会变迁基本动力的冲击与传统乡村社会弹性结构互动的过程。既然传统乡村社会是一个“弹性结构”，那么在革命、改良的冲击下，其变迁就有可能遵循类似于弹性物体的形变与反弹、变与不变等运行逻辑展开。作者描述了在革命和改良的冲击下传统乡村社会结构的变迁轨迹：在乡村革命的冲击下，乡村社会结构经历了一个由表层结构形变、深层结构内核保留到整体结构反弹的过程；在乡村改良措施的作用下，传统乡村社会“弹性结构”具有明显的“重建”容易、“复兴”却难的弹性特点。作者认为：出现这种结局的根本原因，在于乡村社会改造的对象存在着一个不易改变的“弹性结构”。这种结构就像一张巨型的弹性之网，

它可以在很大的程度上消减革命与改良的绩效。因此，传统乡村社会实现现代化的关键就在于弹性结构的解构。

很高兴地看到，这几部书的作者们一方面继承了中国历史学的优良传统，十分注重史料的收集和考辨，比较熟练地运用唯物史观进行分析，另一方面也对海外中国学的各种理论和方法给予了高度重视，试图运用其中的某些方法来解读文献、解释现象，并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但坦率地说，也留下了一些模仿的痕迹，说明这些理论和方法还没有完全融入自己的研究理念和体系之中。这十分正常，也完全可以理解。毕竟学习和实践需要一个过程。相对于其他作品，万振凡《弹性结构与传统乡村社会变迁——以 1927 ~ 1937 年江西农村革命与改良冲击为例》显得更“另类”一些。该书逐个分析了近年来海外中国学用以解读中国社会的种种“模式”，指出其贡献与不足，同时引入弹性力学的“弹性结构”概念，试图以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在革命——改良冲击下的江西传统乡村社会变迁为例证，为近代中国农村社会变迁史提供一个本土化的分析模型。我赞赏作者的勇气，但也心存疑虑，不知这个“本土化”的模型是否经得起检测，它与 20 年前的“超稳定结构”有何不同？而根据我个人的体会，如果心中总是有着一个模式、装着一块样品，如果总是想追求对某种方法的运用、某种理论的实践，学术研究是无法达到“化境”的。这就需要加快“学习”和“消化”的过程。

其实，任何“科学”的方法都是相对的，任何研究模式都是有缺陷的。没有哪一种“科学方法”可以包治百病，也没有哪一个模式能真正“放之四海而皆准”。历史研究尤其如此。历史学应该同时具有描述和研究人类社会进程的两种功能，应该是多种学派并存、各种方法并用。人类社会发展的精彩纷呈要求历史学的丰富多彩。历史学在本质上是研究人、研究人的思维和人的活动的学科，是人文科学。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差别，不仅仅在于可能复原与

不可能复原、可能重复与不可能重复的差别^①，更在于获取结论的方式和途径的差别，是内心的感悟和仪器的测试之间的差别。自然科学更依赖仪器测试，人文科学更讲究内心感悟。

历史研究当然也需要像自然科学的研究那样，尽可能地用准确的数据说明问题。但当暂时缺乏数据乃至无法获取数据时，也没有必要强求。严格地说，在历史研究中，数据是用来辅助文献记载、用来印证史家感悟，而不是用来决定研究结果。数字可以在具体的细节上修正感悟，但感悟却是整体真实的反映。如果历史学家通过考辨和分析史料得出的本来正确的感悟被貌似准确其实片面的数字修正得不正确了，才是真正的悲剧。当然，也有一些不很正确的感觉会被准确的数字修正或推翻，但这种感觉也一定有它产生的道理，或者说一定有数据所无法表现的历史真实。历史研究的结论应该是反映整体的真实，而未必斤斤计较于个别的真实。相反，无数个真实细节的拼凑，倒是可能破坏整体上的真实。

试举一例。《汉书·食货志》说：“富者田连阡陌，贫者亡立锥之地。”表达的是整体上极端的贫富不均。如果通过所获得数据宣布：以某某富者为例，确实占有大片土地，有田地若干顷，但也

① 复原历史的努力已经产生出一批又一批具有价值的成果，但历史其实是不可能被复原的。西方学者深入到现存的一些原始部族中生活，试图以此来寻找远古时期人类的生活方式和意识形态并取得了重要成果，但也早已陷于困境。因为他们可以说明现存的这一部族的现实情况，但不可能复原这一部族过去的情况，更无法断言这一部族的现实情况即是那些早已不再存在的部族过去情况。一些西方人类学家和中国学者深入乡村或山村进行考察，这对于搜寻当地居民乃至他们的先民的活动信息，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但现在学者们所展示的“田野发现”显然都是经过“污染”的，即都是受现代生活影响的。有了共产党的领导和村委会，有了电灯电话电视机，在这种状态下，今天的傣戏除了脸谱等可以“形似”之外，还有多少“原始”形态？今天的“客家”除了已经少有人住的“围屋”之外，还有多少过去客家的习惯？当然，我提出这些问题并不是否定田野调查，恰恰相反，通过自己有限的田野调查，特别是同行学者大量的田野调查信息，已经给了我许多重要的启示。我的意思仅仅是，田野调查可以获得许多文献和实物资料，也可以获取诸多历史信息，但更多更实在的“感受”和“接近”，却是今天的现状。这也是许多朋友逐渐将目光由古代、由明清投入近代乃至当代的重要原因。

未必“田连仟伯”；同样通过统计宣称：以某某贫者为例，多少有一点土地，或者有一处陋室栖身，并未真的无“立锥之地”。这种研究结果固然达到了具体的、个案的真实，但在整体的真实性上则大打折扣、倒人胃口。

东方和西方的文化差异决定了东方人和西方人思维方式和表述方式的不同，应该保留中国历史学和西方历史学差异的存在。借用谢宏维的书名，东西方之间在学术上应该“和”，应该相互借鉴、相互对话，应该尽可能地“与国际接轨”。但也不必事事都趋“同”。为什么就不可以保留“不同”？为什么必须弄得千人一面，把中国历史学的传统完全抛弃？再改用那句歌词：“如果是这样，我真的很悲哀。”如果这样，这个“轨”宁可不接也罢。事实上，西方学者的研究方法也不是千篇一律，杜赞奇可以建构“文化权力网络”，孔飞力却可以高声“叫魂”；何炳棣可以对明以来的人口统计进行质疑，黄仁宇则可以娓娓叙说万历十五年。

我一直认为，如果有宽松的研究环境、良好的研究条件、平和的研究心态，中国史研究的最好成果应该是由中国学者贡献。因为只有体内流淌着中国血液，才有可能真正用心去感受中国的事情、才可能有与生俱来的对中国问题的感悟。历史学家应该有“纵览天下”的视野，却不必要也不可能承担起“包打天下”的责任。除去浮躁、卸下不该揽起的包袱，好的作品或者更容易出来。

江西师范大学“传统社会与江西现代化研究中心”成立以来，确立了江西民间文献与实物资料的收集与整理、明清江西移民与中国西南部地区的开发、江西近代社会转型三个重点研究方向，“江西传统社会与近代转型”丛书的出版，正是其中部分成果的展示。

目 录

总 序 绪 论

第一章 双重角色：九江的传统功能

- 第一节 江西地方行政中心与经济边缘 (14)
 - 一、府治：地方行政中心 (14)
 - 二、四镇之繁荣与九江经济的边缘性 (19)
- 第二节 九江关的设立 (31)
 - 一、明代九江钞关之创设 (31)
 - 二、清代九江关地位的上升 (34)
 - 三、海关设立后常关地位的逐渐下降 (39)
- 第三节 “七省通衢”：长江流域货物调剂中心 (41)
 - 一、商品融通 (41)
 - 二、直隶九江卫：粮食漕运基地 (46)
 - 三、九江关对九江城市社会的影响 (50)

第二章 开埠通商：九江近代角色的转换

- 第一节 九江开埠 (55)
 - 一、开埠经过 (55)
 - 二、关税机构 (59)
- 第二节 通商口岸：直面世界的窗口 (65)
 - 一、租界和避暑地的开辟 (65)
 - 二、洋行的设立 (72)

三、教会与西方文化的楔入	(80)
第三节 江西贸易中心地位的形成	(86)
一、商路变迁与货流的逆转	(86)
二、传统市镇的衰落与九江贸易中心	(92)

第三章 江西门户：九江与江西内腹地区关系透析

第一节 市场：结构与关系	(96)
一、多层级市场网络	(96)
二、市场重心的位移	(103)
三、各级市场之关系	(111)
第二节 流通：进出口贸易	(113)
一、土货出口	(113)
二、进口货物	(125)
三、进出口贸易状况分析	(132)
第三节 产业结构的局部调整	(137)
一、农业作物结构的变化	(137)
二、非农产业的变动	(144)
三、近代工矿业的生产	(150)
第四节 社会生活的缓慢变迁	(153)
一、信息的吸纳与传输	(153)
二、社会风气的变化	(158)

第四章 边缘化：九江与长江流域关系新构架

第一节 长江口岸开放的基本格局	(163)
一、沿江口岸城市的逐步开放	(163)
二、长江贸易中心城市的形成	(166)
第二节 九江与贸易中心城市的互动	(173)
一、九江与上海	(174)
二、九江与汉口	(191)

第三节 九江在长江中游的张力与边缘化·····	(196)
一、九江在长江流域的张力·····	(196)
二、九江边缘化趋势·····	(206)

第五章 新旧杂糅：九江近代社会的转型

第一节 九江经济的逐渐转型·····	(212)
一、对外贸易与商业的转型·····	(212)
二、近代工业企业相继建立·····	(218)
三、金融业的逐渐转型·····	(227)
第二节 城市结构与功能的转变·····	(232)
一、人口的增加和城区规模扩大·····	(232)
二、市政建设与管理的改善·····	(237)
三、城市功能的改变·····	(245)
第三节 城市社会生活的缓慢变迁·····	(248)
一、居民结构和家庭功能的变化·····	(248)
二、中间组织的变化和正规化·····	(252)
三、城市文化的优化·····	(256)
第四节 社会转型的重叠性·····	(260)
一、传统政治功能的沿续·····	(261)
二、传统商业的经济功能·····	(262)
三、传统文化的继续流传·····	(265)

结语：区位与兴衰——兼及九江城市发展的若干因素

附 表

附表一：清代及民国九江关税收入一览表·····	(282)
附表二：九江海关历年关税收入表·····	(285)
附表三：赣北部分州县农村集市增长情况表·····	(286)
附表四：民国政府江西省实业厅、财政厅、农商部等呈请 实业部核发营业执照表·····	(287)

中心与边缘：九江近代转型的双重变奏

- 附表五：江西九江私立儒励女子中学校毕业生一览表
(1892~1932) (292)
- 附表六：1936年九江报关转运栈业一览表 (300)
- 附表七：九江县民众自卫总队浔阳镇自卫大队第十中队
队丁名册 (301)
- 附表八：1933年儒励女中全体教职员一览表 (303)
- 附表九：九江航业公会第二届执监候各委员一览表 (305)

主要参考文献

后 记

绪 论

城市是一个多因素、多层次、多侧面所构成的多功能综合体，是一个系统的、动态的立体社会。中国地域辽阔，各地区社会历史条件的差异，资源、地理环境的不同以及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决定了城市发展不可能是单一的，而必然是多样化的。这一前提，给城市问题的研究提供了广阔的空间。人们从不同的学科领域，从不同的角度，对不同的城市进行考察，导致城市问题研究的繁荣。历史学亦比较注重城市问题的研究，尤其是近年来，史学界对中国城市近代化问题的研究更是方兴未艾。

在不同类型的城市研究中，近代口岸城市研究无疑是人们最为关注的一个领域。口岸是国家门户，西方国家工业产品和其他一切近代事物正是经由口岸进入中国广大城乡的。在中国近代转型过程中，口岸城市的变化产生了明显的示范效应。因而许多寻找中国近代性变化原因的学者都试图透过通商口岸这一社会单元，来认识近代中国，相关成果迭出。这些成果，既有集中在口岸城市体系、城市群的综合研究；亦有针对口岸城市发展、演变的个案研究。从综合研究上看，由于顾及到口岸城市的整体性，对具体口岸城市则很难深入；而个案研究，则主要集中在一些大的、有影响的或者是经济发达的口岸城市的若干侧面，对于内腹地区或者偏远地区的中小口岸城市则缺乏系统、深入的研究。

九江是长江流域的一个中等口岸城市，也是中国近代开放的第